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艺术教育的九个路径

□ 巴 图

红色文化资源是由革命人物、革命物态、革命事件、革命活动、革命精神构成的内容体系，包括遗址踪迹类红色文化资源、建筑与设施类红色文化资源、重要革命历史文物、重要文艺作品等，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管理和运用，反复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新时代艺术教育用好红色资源提出了任务，指明了方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就需要将红色文化资源从多个路径上融入艺术教育，具体来说可以从九个路径切入。

一是融入艺术院校文化传承。在新中国艺术教育发展历程中，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的艺术教育血脉之中，沉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院校独有的精神品质。新时代艺术教育更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赓续革命传统，坚持为党育才、为国育人。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通过深入开展“四史”特别是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深刻融入红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实现艺术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深度融合。

二是融入艺术院校学术研究。红色文化是个历史范畴，经历了形成、发展、积淀、丰富、创新的演进过程。推进红色文化与当代艺术教育的融合与创新，需要准确把握党领导艺术战线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重点积累和掌握党领导革命艺术工作历史中所积累形成的红色文化资源。我国红色文化资源在艺术领域存量众多，需要自觉进行全面搜集整理，需要对这些红色艺术资源的来龙去脉、精神内涵等进行全面分析，进而需要深入研究党领导艺术工作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艺术家。研究确定一批重要革命文艺标识地，研究党领导艺术工作的故事、以革命艺术服务革命斗争的故事、艺术家投入革命事业的故事，这是红色文化更精准地融入当代艺术教育的有效切入点。

三是融入艺术院校思政课程

学。思政课程必须紧密结合学生的思想、文化、艺术学习的特点进行。近年各院校探索“艺术加思政”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其核心是兴趣导入、需求导入，挖掘各艺术门类中思政教育资源，结合思政教育理论，增强教学的亲和力和学生参与性。进一步提升思政课程质量的重要渠道是以红色文化资源为选材方向的艺术情景教学，即以理论教学的实际需要科学遴选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真实的叙事功能、丰富的抒情功能、自然的说理功能，把好故事与好思想结合。课堂教学中运用红色文化教学案例，鼓励学生以所熟悉的艺术方式演绎红色故事，逐步扩大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环节，大力开展现场情景教学，在红色文化的产生地触摸历史，体验红色文化的真谛。

四是融入艺术院校专业课教育。剧目教学是专业表演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剧目课是表演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剧目的选择、使用、更新是课程的基础，应全面审核教学剧目的方向、立意、选材，选择更多优秀红色艺术作品成为教学剧目。要强化对课程教材中相关学术、学风、专业内容等方面的政治思想把关，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切实发挥教材的育人功能。可以结合各艺术院校专业特色，总结提炼红色经典艺术作品，将其中符合教学的作品直接引入教材，加工转化为课堂教学案例。在教学中倡导学习红色经典、研究红色经典、传承红色经典之风，为教材建设注入红色基因和生机活力，实现红色文化教育资源与艺术专业学习的科学衔接与深度融合。

五是融入艺术院校实践与创作。文艺创作不能只是“一个人的风花雪月”，应鼓励学生学习和演绎优秀红色经典作品，引导师生从红色文化资源中选材创作，讴歌英雄，书写时代，抒发爱党情怀。当年鲁迅艺术学院的革命艺术家创作的《白毛女》《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经典作品，就是把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艺术教育事业中的有益探索。北京舞蹈学院建校以来创排

了多部从红色文化资源中选材的优秀作品，近年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10个红色经典故事为创作源泉创排舞蹈诗《那些故事》，以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为素材创排舞剧《井冈，井冈》，今年启动“为人民而舞”庆祝建党百年百部红色作品展播活动，系统梳理传播学院前辈原创的百部经典剧目，用舞蹈艺术传播红色文化资源。

六是融入艺术院校艺术采风。采风是艺术教学的重要实践环节，是对课堂专业学习内容的体会和验证过程，也是学生初级的艺术创作形式。成功的艺术采风往往与自觉的动机设置、内容安排乃至地址选择相关联。带领学生走进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亲身体验革命战争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可以让师生都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创作冲动。在采风艺术实践教学过程中，要从现有的艺术课程教学体系中确定实践动机，从恢弘的红色资源中确定教育特色，实现艺术实践动机与红色资源特点的结合。

七是融入艺术院校校园文化。将红色文化资源积极向校园生活进行有效延展，实现红色文化对校园文化的积极濡染，是引领校园主流舆论的重要方式。应当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用革命史实说话，用革命道理论道，增强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也要着重探索具有时代风格、艺术特性、学习特点、生活气息的融入方式，探索增添融合发展的新元素、新思路、新样式，潜移默化实现政治情感提升、科学历史印证和文化艺术拓展效果。

八是融入艺术院校的宣传教育。在党领导下追求真理、报效家国、服务人民、探索艺术的优秀艺术家。已经凝聚成为艺术界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北京舞蹈学院第一任校长戴爱莲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印度代表团即将访华，周恩来总理找到戴爱莲，认为可以创作一个以“荷花”为形象的舞蹈作为欢迎节目。为做好这个作品，戴爱莲开始

搜集素材。她融合了来自陇东、陕北地区的民间舞蹈形式“莲花灯”和中国古典舞最基本的动作语汇“顺风旗”和“圆场”，创造了“荷花”这一独特的审美意象。1953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荷花舞》获得银质奖章。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戴爱莲先生90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说：“当我还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受到了党的影响。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我很幸运，看到了繁荣的今天！”她对党和祖国深挚的感情，点点滴滴凝结在创作的艺术作品中，跨越世纪，绽放出夺人的光彩。艺术院校可以在校园开辟红色艺术展陈保护区，充分发掘其红色文化基因，全方位保护革命艺术家们遗留下的物品和活动轨迹资料，认真学习其所蕴藏的红色文化内涵和精神。让师生从这些革命艺术家身上、从红色故事当中汲取信仰的力量、艺术的力量、进取的力量，是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艺术教育的捷径。

九是融入艺术院校师生阅读生活。阅读是大学文化的常态，是学生丰富精神世界的渠道。阅读体现出很强的兴趣驱动，表现为突出的自主意识和自觉倾向。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对阅读生活进行科学干预，教师应当对学生阅读进行导学，科学调整阅读方向，有效提升阅读品质。可以通过荐读、导读、研读、评读等多种形式，将体现红色文化资源的书籍报章、戏剧戏曲、音乐舞蹈、美术设计等代表性经典文学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并围绕阅读心得鼓励研究性学习和交流，更加全面深刻地体会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高尚精神。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



君子的义利观

□ 王 蒙

下要服从上，小要服从大，一时要服从久远，要像张载说的那样“论万世”，这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

曾子讲得更厉害，他说：“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君子越是看到利益，越要想到自己的尊严，不能轻率接受某种可能不怎么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利益，更不能贪利失态失准，因利取辱。见到恶人恶事，君子应该想到这种负面的人与事会受到怎样的谴责与诟病，会带来多少后遗症。自己有什么非理性的过分的嗜好欲望，要想想自己的嗜好欲望表现会不会带来耻辱丢丑的后果。而自己的一时感情冲动、激忿发泄，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患恶果。想到这些，君子一生中不可放肆，不可违反礼法规矩，只能谨慎小心，律己从严，有所休惕，有所约束。

曾子的说法，也与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相通，因为作为孔子倡导的核心理念“仁”，也正是义理的首要内涵。

古代圣贤讲了这么多重义轻利的道理，但同时又留下了那么多奸臣贪官的可耻记录，赵高、李林甫、秦桧、蔡京、高俅、严嵩、魏忠贤、鳌拜……罄竹难书，这说明了私利诱惑的危险性，也说明了整顿朝廷风气、官场风气、社会风气与实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不可一时稍息。

从利字、利的概念来说，利其实倒也并不总是义的对立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名联出自林则徐诗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这里用的是《左传》中所述春秋政治家子产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一语，说是对有利国家的事，决不犹豫退缩，可以为之生，为之死，为之牺牲小我的一切，不可盘算做这样的事给个人带来的利害祸福，而要勇于担当，能于出头领先。换句话说，国家、人民、族群乃至全天下全人类的利益，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就是大义正义义理。

从后世的观点来看，孔子所讲的喻于义与喻于利，其意义应该说已经超出了君子小人分野的范畴，而进入了忠良圣贤与奸佞国贼的两个范畴的分野了。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原文化部副部长）

我看君子文化

书院学规最早出现于南宋，又称规约、揭示、学则等。南宋时期，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紧密结合，书院规制日趋完备。学规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思想和人生哲理，是书院制度精华所在。吕祖谦所作《丽泽书院学规》为学规之始，而影响最深远的学规则为理学家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简称《揭示》）。《揭示》不仅对书院师生道德情操的养成有着积极作用，更是朱熹理学思想在书院教育中的集中体现。

朱熹撰写“揭示”

朱熹认为，教育是“政事之本，道德之归”。朱熹一生与书院有着不解之缘，曾创建、修复了包括寒泉、武夷、岳麓、白鹿洞在内的多所书院，白鹿洞书院也由此获得新生。

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家，书院成为他们传播自己学说的主要阵地，朱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生活的年代，由于多年战乱、政府财力匮乏，导致当时官学“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圯，舍斋荒废”。朱熹认为当时的科举教育过于功利化，沦为士子“钓声名、取利禄”的手段，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则“未有闻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朱熹试图以振兴书院来达到使读书人懂得“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目的，扭转世风日下之局面。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山川环合，林谷幽邃。北宋初年，白鹿洞书院由庐山国学改建而成，此时的书院规模不大，影响力也有限。朱熹重修书院，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白鹿洞书院才真正声名鹊起，跻身四大书院之列。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中记载：“嵩阳、

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曾到访白鹿洞书院，见书院荒废已久、断壁残垣，唏嘘不已，他认为白鹿洞书院“累圣相传，眷顾光宠，德意深远，理不可废”，遂下定决心复兴书院，为书院置办院产，征求图书。朱熹又力排众议，说服宋孝宗为书院赐额，白鹿洞书院正式得到官方支持。在朱熹的不懈努力下，书院在荒废百年后重获新生，并逐渐闻名遐迩，被后世学者誉为“天下书院之首”。书院开学之际，朱熹亲自讲说《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即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又名《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朱子教条》），希望以此勉励诸生。《揭示》集中诠释了朱熹关于书院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才的教育思想。

正文仅百余字

《揭示》简明扼要，正文仅百余字，可分成5方面内容，依次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为书院教育提出明确的目的要求和培养途径。《揭示》正文是朱熹借用先贤言论，结合自身理学思想之精髓归纳而成，实现了创造性诠释，不愧为理学集大成者。

首先，朱熹将以“明人伦”为核



心的“五教之目”列在《揭示》之首，“学者学此而已”，说明“明人伦”是书院教育的根本所在，体现了“明人伦”的重要性。“五教”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立德是书院教育之根本。

其次，朱熹提出了“为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朱熹看来，做到学、问、思、辨，便可“穷理”，并且将“为学之序”运用于书院的教学活动中，将其融入读书方法之中。朱熹十分看重读书，他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为此提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

志的六则“朱子读书法”来指导生徒读书。在朱熹看来，学习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故要求生徒研读儒家经典应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序，而《四书》又置于《五经》之前，循序渐进、由表及里。

最后，“穷理”要落实在“笃行”之上，两者构成书院教育的两翼。朱熹将“笃行之事”细化为“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三部分，足见这位理学集大成者对道德实践的看重。南宋时逢乱世，理学家们以培养经世济民之人才为己任，而抵抗科举利诱，摆脱场屋俗学的关键则在于“笃行”。其中，“修身之要”是指“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与“立德”相辅相

成，诚实守信、恭敬谨慎、知错能改是为人的基本原则。“处事之要”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曾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养成正确的义利观，提升个人品德修养。朱熹对“接物之要”亦有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在人际交往方面的经验之谈。处事待人要宽宏大量，与人为善，以“恕道”精神为准绳。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则强调严于律己，时刻进行自我反思，完善人格。《揭示》充分反映了儒家的修身思想，如果说学、问、思、辨停留在认识层面，那么“笃行”则上升至道德践履的高度。“穷理”与“笃行”缺一不可。通过上述努力，就能实现理学家们“传斯道而济斯民”的远大抱负，开创河清海晏的盛世局面。

“揭示”影响海外

理学注重培育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白鹿洞书院揭示》所要达成的目标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而后“推己及人”。“修身”是“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基础。“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是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生徒的真切希望，也是古之哲人对修身、处事、接物等多方面内容的深刻思考，更是千百年来书院精神的真实写照。

由于《白鹿洞书院揭示》揭示的是“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因而具有宏观性、纲领性，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所以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评价《揭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漳州知州，重建岳麓书院，将《揭示》移录其中，史称《朱子教条》。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赵昀视察太学，手书《白鹿洞书院学规》，赐示诸生。其后，或摹写，或刻石，或模仿，《白鹿洞书院揭示》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于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

明代白鹿洞书院多位洞主都曾参考《揭示》，拟定新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明代理学家胡居仁所作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对朱熹的《揭示》极力推崇，“愚惟朱子《白鹿洞规》至矣尽矣，士希贤，贤希圣，举不出此矣。”他为东林书院制定的《东林会约》，就是在《揭示》基础上完成的。

清代经学家李文炤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曾编写《岳麓书院学规》，其中“学问思辨，必以力行归”等思想与《揭示》可谓一脉相承；岳麓书院另一位山长王文清所编订的学规则对学子提出尊敬师长、明辨义理、崇尚节俭等道德要求，将《揭示》中德育内涵系统化。

《揭示》还名扬海外，如朝鲜著名学者李退溪的《伊山书院学规》、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的《藤树学规》，均是以《揭示》为蓝本所创。

